

吳郡范

成大撰

風俗

黃芾著

方志論集

大抵然也其人並習戰號爲天下精兵俗以
五月五日爲鬪力之戲各料彊弱相敵事類
講武宣城毗陵吳郡會稽餘杭東陽其俗皆



K2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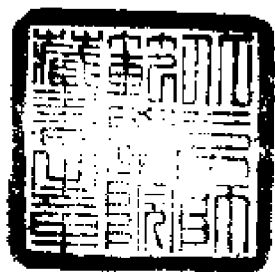
黄苇著

方志論集

顧廷龍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40342

940342

0258/06

方 志 论 集

黄 苇 著

责任编辑 潘一平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武林路125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625 插页4 字数25.8万 印数0,001—4,000

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103·89

定 价：1.54 元

序

黄苇同志近著《方志论集》，粗读一过，颇觉其考证源流，材料丰富，论述清晰。有宏观通篇，如《地记与图经考述》、《论宋元地方志书》，也有微观具体，如《论临安三〈志〉》、《关于〈越绝书〉》。宏微交辉，总的是说明我国方志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全面，从体例不全到日臻完备的发展过程。对后人超出前人之处，作者也作了明确的概括。读诸文，对我国方志之长成可见一斑。

编纂方志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然而纵令方志之书，汗牛充栋，却一直乏人作较系统的研究。古人有之，也多佚亡。作者在这方面大费精力，开始深入细致的探索，成绩突出，值得庆贺。

临安三《志》载述宏富，叙述明晰。所有建置、沿革、名胜、风俗、户口、粮商、人物、艺文，乃至山川、道路、物产等等，著之甚详；记述与图表并茂，横列门类，纵贯时代，体例井然。今日杭州之所以成为世界名胜，风景文物传之后世，“真箇苏杭闻见广，艺林佳话遍天涯”，南宋临安三《志》，可谓首建其功矣。在这里可见旧志作用之一斑。同时也可看出编修社会主义新志与整理、研究旧志，关系多么紧密。作者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在论述旧志的同时，为普修新志，提供借鉴，匠心独运，为整理和研究旧志，为编修新志服务，作出了贡献。

对《越绝书》的考证，作者吸取前人的成就，也提出自己的见解，论证方志之滥觞，为方志学的探索打下基础。

当前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编修社会主义新志、整理研究旧志，已成为急需解决的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课题。我们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依靠广大编修新志和整理旧志的同志以及这方面的专家共同努力，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不仅为普修新志开创道路，而且也是整理古籍，吸取我国古代丰富多采的文化成就所必需。祝愿我国编修新志、整理旧志的园地开出愈来愈多鲜艳灿烂的花朵。

朱士嘉

一九八三年三月

前 言

方志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应该继承、发扬和创新，并在这—基础上，编修出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方志。现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编修新志，整理旧志，完全可以预期，一定会取得丰硕的成果，作出超越前人的贡献。

方志学是一门古老的科学，也是一门年轻的科学。我们的前人和当代先达在这门科学领域内，已经作出了很大的成绩和贡献。我写这几篇论稿，就是想追随他们之后，试图在这方面作一些探索和研究。

这里辑录的十几篇论稿，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探索方志源流，第二类是评述几种名志，第三类是研究方志理论，第四类是阐明方志的价值和作用，第五类是讨论旧方志的继承和创新以及新方志的编纂等问题。

这本集子的编辑出版，得到了上海图书馆古籍组的大力协助；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先生还为本书题签了书名，方志学前辈专家朱士嘉先生为本书写了序言。这里一并致以深切的谢意。

这本集子里所附《历代诸家方志论文篇目选录》，是上海图书馆陈秉仁同志编辑的。

黄 苇

一九八三年一月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目 录

序

前言

方志渊源考辨	(1)
秦汉杂述与方志发端	(21)
地记与图经考述	(44)
论宋元地方志书	(79)
关于《越绝书》	(106)
论临安三《志》	(121)
章学诚方志理论研究	(145)
评章学诚七《志》书后	(178)
地方志与经济史	(200)
《上海史》与地方志	(217)
从方志资料考察中国近代集镇墟场的兴衰存废问题 ...	(225)
论方志的继承和创新	(252)
编纂新方志刍议	(271)
〔附〕历代诸家方志论文篇目选录	(282)

方志渊源考辨

方志卷帙浩繁，源远流长。关于方志何由发展演化而来，渊源何自，源头应在何处，这是研究方志学需要探明的重要问题，也是历来众说纷纭的复杂问题。古今历史学家和方志学家，对这个问题，作过多方面的考辨，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云导源于《周官》，有称源头是《禹贡》，有曰应溯源到《山海经》，还有认为昉自《越绝书》、《吴越春秋》或《华阳国志》，等等。这些不同说法，长期并存，各言其是，迄今未有一致结论。这里，不揣浅陋，也提出一些不成熟看法，供作研究参考。

一、关于《周官》

方志导源于《周官》之说，由来已久。宋司马光云：“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里，亦其遗法也。唐丽正殿直学士韦述为《两京记》。近故龙图阁直学士宋君敏求，字次道，演之为《河南》、《长安》志。凡其废兴、迁徙，及宫室、城郭、坊市、第舍、县镇、乡里、山川、津梁、亭驿、庙寺、陵墓之名数，与古先之遗迹、人物之俊秀、守令之良能、

花卉之殊尤，无不备载。”^①司马光在这段论述中，从北宋宋敏求纂修的《河南志》和《长安志》出发，上溯到唐韦述所撰《两京记》，然后将其源头直追至周官的职方、土训和诵训，认为方志渊源就在于此。

司马光所说的周官，即周朝王室的官制，后成书为《周礼》，亦称《周官》。《周官》共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其中，《冬官司空》早佚，汉时，补以《考工记》。《周官》作者和成书时代，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今文经学家则称出自战国，后世也有人指作西汉刘歆的伪造。近人从出土周、秦铜器铭文中，考定为战国时作品。司马光所述的职方即出自《周官》中的《夏官司马》篇，土训和诵训则载于《地官司徒》篇。

司马光以后，主张方志渊源于《周官》说最力也最有影响者，要数清章学诚。章氏认为：“方志之由来久矣。……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章氏自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梣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②章学诚这段论述的含义是：方志导源于周官外史所掌的四方之志，亦即晋《乘》、鲁《春秋》、楚《梣杌》之类的一国之全史。

章学诚与司马光虽然都主张方志导源于《周官》，但谈到具体渊源所在，所指却不相同。司马光指的是其中的职方、土训和诵训，也就是偏重于舆地图经，而章氏所指却是其中的外史，也就是主张地方志即地方史。

宗方志导源于《周官》之说者，自来还有不少。如宋马光祖在《景定建康志序》中云：“郡有志，即成周职方氏之所

掌。”^③元人黄潘在序《东郡志》时，述及：“南山宋公，以侍御史致政居滑州。滑领二县，而治白马，白马故东郡地也。公暇日阅前史及它传记，得东郡事，参以旧闻，作《东郡志》十有六卷，……。潘窃惟……，是以成周之制，职方氏掌天下之图，而道地图以诏王者，有土训之官焉。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诏王者，有诵训之官焉。”^④清人沈世枫亦称：“郡国有志，昉于春官·外史、夏官·职方。”^⑤

以上诸家之说，有些是出自修志实践，有些则得之于对方志理论的探求，虽然大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有的也尚须推敲。

司马光主张方志导源于周官职方、土训、诵训的理由，推究起来，首先在于，据《周官》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⑥《周官》的这段记载及其以下的解释表明，职方氏执掌天下之图和地，并按扬州、荊州、豫州、青州、兖州、雍州、幽州、冀州、并州这九州之国，辨明各地的山川、湖泊、薮泽、人民、物产、财用等，而这些方面正是后世方志所多载。所以，在周官职方氏的这类职掌中已露后世方志之端倪，从而可以说是其渊源所在。其次，周官“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⑦据东汉郑玄注称：“道，说也，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若云，荊、扬地宜稻，幽、并地宜麻。”^⑧这可看作职方的补充，也同后世方志有渊源。此外，《周官》载：“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⑨郑玄注称：“说四方所识久远之事，以告王观博古

所识，若鲁有大庭氏库、穀之二陵。”^⑩这类古迹遗事也是后世方志所多载，从中亦可察知其间存在渊源关系。所以，司马光云，后世学者仿周官职方、土训、诵训，为书以述地里，这是有道理的。

章学诚关于方志导源于周官外史之说，若云其所掌四方之志是一方之全史，又据对史作广义理解，认为方志是将一地古今事物包揽无遗，从而推论出后世方志即由此而来，这当然也勉强说得通。因为，后世方志确可看作国史的具体而微，无所不载。但值得研究的是，《周官》原书中关于外史掌四方之志的记载非常简单，只称：“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⑪其中并未说明四方之志内容和体例如何，更未语及统合古今，无所不载。这就只能说，章氏所谓“外史掌四方之志，是一国之全史也”，不过是他的主观推测，并无实据。至于他将晋《乘》、楚《檮杌》、鲁《春秋》说成就是一国之全史，就是周官外史所掌的四方之志，那也是想当然之语。因为，晋《乘》和楚《檮杌》早已亡佚^⑫。虽然郑玄于《周官》“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下，注称：“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楚之《檮杌》”，但晋《乘》和楚《檮杌》，章氏并未能见，郑玄曾否见到亦属疑问。章氏既未能见，何由知其为一国之全史，又何以知其即为周官外史所掌的四方之志，更何能说它们是统合古今，无所不载，因而具备方志之体？鲁《春秋》现虽尚存，但如细加考察，却知它同后世方志并非一类。元人张铉在所纂至正《金陵新志》中即已论及：“《乘》、《檮杌》缺亡，不可复知。以《春秋》经传考之，诸所记载，或承赴告，或述见闻。其事有关天下之故者，虽与鲁无预，皆书于册。其

非义之所存，及见闻所不逮者，虽本国事，亦或弃而不录。”^⑬《春秋》于本国事可以弃而不录，于天下事，虽与鲁无预，而皆书于册，可见它并非如章氏所说，是一国之全史。这同后世方志，无论在体例上或载述内容方面都大不相同，因而不能看作后世方志的源本。这就是说，章学诚关于方志导源于周官外史之说，乃是缺少实据的主观推论，看来是难以成立的。

所以，如将章学诚之说同司马光之说作一比照，应该说，还是司马光之说颇合史实，较为有理，而章学诚之说，虽然影响很大，但仔细推敲起来，却不能不使人感到怀疑。

章学诚之说能否成立，固然是个问题。但由于《周官·职方、土训、诵训》中确有方志渊源，方志同周官存在源流关系，却应是可以肯定的。不仅如此，由于自来历史学家和方志学家主此说者甚多，加以章学诚又曾刻意经营和着力强调，此说一直较其他诸说为流行，影响也较大，因而在诸说中占有主要地位。

虽然如此，但还应看到，后世学者在探求方志本源时，有些还每每将《禹贡》等与《周官》并列，即不仅提《周官》，而且列《禹贡》，有的甚至首列《禹贡》，次才及《周官》。例如，晋挚虞所纂《畿服经》，“其州郡及分野、封建、事业、国邑、山陵、水泉、乡亭、城郭、道里、土田、民物、风俗、先贤、旧好，靡不具悉”^⑭，因而已是后世方志雏形。此志虽已亡佚，但佚文辑录片段，仍为后世所重。《隋书·经籍志》叙及此志时，即曾指明：“晋世挚虞，依《禹贡》、《周官》作《畿服经》。”^⑮可知《畿服经》之作，不仅昉自《周官》，而且取源《禹贡》。又如唐人贾耽所纂《贞元十道录》，亦已初具方志规模。权德舆在序此志时，宣称：“自夏书《禹贡》、

《周官·职方》、《汉志·地理》，厥后史臣，继有其书。……又提其要令，切于今日，为《贞元十道录》四卷。”^⑩这又不仅将《禹贡》同《周官》并作方志源本，而且语及《汉书·地理志》。由此更可见，方志并非仅仅导源于《周官》，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源头，例如《禹贡》就是其中之一。

二、关于《禹贡》

《禹贡》是古代典籍《尚书》中的一篇。由于其中记有夏禹平治水土事迹，旧时常被视作夏代作品。近人经过考证研究，断定是战国时人所补作。《禹贡》假托夏禹治水以后，将全国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作为全国的行政区划，并在这一基础上，按州将所在地区的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田等、贡赋、交通以及少数民族居住地等作了简明而又系统的叙述，是我国最早分地域记载各方地理、物产、贡赋等情况的专篇，因此也历来为修志家和论志家所重视，每被奉为后世方志渊源所在。

唐贾耽在进《海内华夷图》表中称：“谨令工人画《海内华夷图》一轴，……，并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国以《禹贡》为首，外夷以班史发源，郡县纪其增减，蕃落叙其衰盛。”^⑪又，《玉海》载：“贾耽撰《海内华夷图》及论次地理之书，凡五十有五编。言方志者，以为名家。”^⑫贾耽在述及其所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时，如此明确将其源头首列为《禹贡》，方志与《禹贡》有渊源关系，于此可见一斑。再，元人张铉云：“古者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纪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图志兼记事

记言之体，自由川、物产、民俗、政教、沿革、废置、是非善恶、灾祥祸福，无不当载。”^④从这段论述中，也可看出，张铉在探索方志源头时，是把《禹贡》列作首位，其次才及于《周官·职方》、春秋诸侯国史以至汉郡国图志。

综览古今有关方志论述，虽可知主张方志导源于《禹贡》者较《周官》为少，居于次要地位，但因此说也历来为人广泛传述，这就同样值得重视。实际情况也确应如此。首先，从体例来考察，后世纂修的许多方志，特别是全国性的区域志，不少是昉自《禹贡》的。例如，唐李吉甫纂《元和郡县图志》，就是依《禹贡》别九州之例，将天下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及陇右等十道来进行载述的^⑤。又如，宋王存纂《元丰九域志》，也依《禹贡》别九州之例，按宋制将天下分为四京及京东、京西、两浙、江南、荆湖、梓州、夔州、福建、广南诸路等，而确立其全书结构^⑥。这都说明后世方志在体例方面同《禹贡》存在着源流关系。其次，后世有些方志的若干载述内容也昉自《禹贡》。例如，《元丰九域志》在确定了分天下为四京及京东、京西等诸路的体例结构后，又于各路之下分别条列本路地里、户口、土贡及属县等。这又在内容叙述方面与《禹贡》诸州记载略同。再次，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已是方志雏形。清人周中孚经考证，称：“《华阳国志》是因摘《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句之二字以名之也。”^⑦可见，有的方志，题名也同《禹贡》有关。此外，更重要的是，有些撰志家在叙述其志所本时，还曾明确自称是以《禹贡》为准。例如，元人朱思本在所撰《九域志·自序》中写道：“思本……取《元和郡县志》以及《太平寰宇》、《方輿胜览》、天官、輿地诸书，深加检校，思欲

辑理一书，以附诸君子之后。……暇日因取群籍，参考异同，分条晰理，一以《禹贡》九州为准的，乃以州县属府，府属都省，以都省分隶九州焉。……书成凡八十卷，题名曰《九域志》云。”^②这是朱思本的自述。他就是如此将《禹贡》作为其所撰《九域志》之准则和源本的。

上述情况说明，方志源头不仅在《周官》，而且有《禹贡》，即《周官》、《禹贡》均系后世方志渊源所在。虽然如此，但仍不能认为方志源头仅此为止，别无其他。因为，首先，后世方志门类甚广，内容繁多，有些方面，如风俗、人物、仙事、异闻等等，就与《周官》、《禹贡》并无渊源。正如后人所指明：“《禹贡》纪物产而不及风俗，……职方载地理而不及人才。”^③可见后世方志中，《周官》、《禹贡》缺载部分，必然另有渊源，需要进一步探求。其次，有些修志家在其著述中也自认，所纂方志，除《周官》、《禹贡》外，还别有所本；甚或有自称既不本《周官》，也不本《禹贡》，而是另取来源者。例如宋欧阳忞即曾在其所撰《舆地广记·序》中宣称：“予……尝自尧、舜以来至于今，为书凡三十八篇，命之曰《舆地广记》。凡自昔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地志，旁见杂出，莫不入于其中，庶几可以成一家之言，备职方之考，而非口传耳受，尝试之说者也。”^④欧阳忞在这段序文中，只谈到史官之作与夫山经和地志，而未提《周官》和《禹贡》，足见其所撰《舆地广记》是另有所本，而《山海经》即其中之一。所以，在探索方志渊源时，《山海经》也是不能忽视的。

三、关于《山海经》

《山海经》是一部特具风貌的先秦古籍。作者不详，著作时代亦无定论，大约先系口头传说，至战国时开始有文字记录，秦、汉二代又有增补，唯主要部分成文年代较《禹贡》还早。全书十八卷，分五藏山经、海外经、海内经、大荒经等十八篇，约共三万余字。《山海经》内容丰富，记载了古代巴、蜀和楚国及其以外许多地区的四十个邦国、五百五十座山、三百余条水道以及这些邦国中的地理状况和风土、民情、物产、祭祀、巫医、神祇、怪异等，此外，还叙述了百多个历史人物，以及这些人物的世系和活动。此书自古称奇，常被斥为“怪诞不经”。司马迁见曰：“《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②明人邢让等在重刻《山海经》序言中亦称：“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闕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莫不疑焉。”^③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认为：此书“多参以神怪，故道藏收入太元部竟字号中。究其本旨，实非黄老之言。然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无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④，因而将它列入小说家言之类。后经清毕沅和郝懿行等考证注释，始渐为世人所重。

探索方志源流，其所以要述及《山海经》，首先是因为有些古方志叙述纂修缘起时，每每提及此书。除上引欧阳忞《舆地广记·序》中提到者外，兹再举数则。宋元丰间，王存纂《九域志》，据《玉海》载称：至“绍圣四年九月十七日，兵部侍郎黄裳言：‘今《九域志》所载甚略，愿诏职方取四方郡县山川、民俗、物产、古迹之类，辑为一书，补缀遗缺。’

诏：‘秘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检阅’。”^⑤黄裳所要辑补的即是后来成书之《绍圣九域志补遗》。此志虽纂者不详，且已亡佚，但从“诏：‘秘省录《山海经》等送职方检阅’”来看，当是以《山海经》为主要源本。又，齐陆澄曾纂《地理书抄》二十卷，乃古方志雏型。此书虽亦亡佚，但《隋书·经籍志》载称：“陆澄聚（《山海经》已来）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⑥这也证明，后世纂修地志者每多取法《山海经》。其次，从后世方志的某些内容来考察，也或多或少可以看出《山海经》中的某些记述是其渊源所在。汉辛氏纂《三秦记》，唐刘知几称作地理书，列入史家的第九流^⑦，应是方志发端之作。此书虽已早佚，但章宗源在《隋书经籍志考证》中称：“《通典》州郡门注谓，‘辛氏《三秦》之类，皆自述乡国灵怪’。今考诸书所引《三秦记》，如：骊山始皇祠，不斋戒往，即疾风暴雨（《续汉郡国志·注》）；陈仓城石鼓山，将有兵，则山鸣（同上）；桃林塞，有军马经过，好行则休息林下，恶行则决河漫延不得过（《水经·河水注》、《元和郡县志·河南道》）；狗枷堡，秦襄公时，有天狗来，下有贼，狗吠之，一堡无患（《水经·渭水注》、《艺文类聚·兽部》）；骊山西北有温水，祭则得入，不祭则烂人肉（同上）；陈仓山有石鸡，晨鸣山头，声闻三里（《史记封禅书正义》）……。”^⑧从这些佚文辑录看来，辛氏《三秦记》所述确多“乡国灵怪”。此正与《山海经》中的某些记述略同。又，《禹贡》记物产而不及风俗，职方载地理而不及人物，然《山海经》所述，既有风土、人情，又涉人物、世系。这些不仅已补《禹贡》与《周官》之无，而且正同后世方志风俗、人物门类吻合。此外，后世方志多有祠庙、碑碣、仙